

# 国际关系中的圈层外交分析方法

## ——以土耳其外交为例

张峻溯

**内容提要** 既有研究对土耳其外交行为根源的理论解释有显著差异。基于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关系结构的外交分析新框架。国家处于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网络(圈),在关系网络中具有不同的地位等级(层)。根据亲缘、地缘和历史三个方面的关系因素,国家将分别形成不同的关系圈层。外交是国家在关系圈层内运作关系的过程,会遵循不同的关系法则。土耳其在亲缘圈层中秉持“需求法则”,维系基于相似语言和宗教意识形态的情感性关系,坚定支持突厥语国家和“穆斯林兄弟会联盟”;在地缘圈层和帝国圈层中,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俄罗斯和原奥斯曼帝国领域内国家的互动兼具“人情法则”和“公平法则”,开展了互惠型和对等型利益交换。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圈层外交分析方法 土耳其 关系结构 关系圈层

---

\* 张峻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博士生。(邮编:100091)

\*\* 笔者衷心感谢曾向红教授的支持与指导。本文曾在第十七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上宣读,感谢各位评议人及《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在正义与发展党(以下简称“正发党”)执政期间,土耳其外交在徘徊与动荡中曲折前进。对于土耳其外交的变化,既有研究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路径。相当一部分研究认为,土耳其外交超出了其中等强国地位。伊斯兰保守派精英对国家实力的误判、国内民粹主义对外交目标的话语建构,以及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集权所形成的“个人主义”政治决策,导致土耳其外交进退失据。<sup>①</sup>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昝涛指出,土耳其外交与奥斯曼文明—地理空间关系的演变密切相关;面对复杂的周边局势,土耳其外交常常是进两步又退一步,这是土耳其政治精英与西方长时间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娴熟外交技巧。<sup>②</sup> 正发党执政的 20 余年间,土耳其虽然遭遇过外交困境,但总能巧妙化解危机。在世界大国之间,土耳其基本实现了平衡各方的灵活外交,甚至在俄乌和谈、叙利亚战后重建等国际问题中发挥关键作用。

考察既有研究,在西方理论视野下,土耳其外交行为出现“异化”。一是将土耳其视为固定不变的个体,试图从土耳其国家的内部特征和外部结构两个方面寻找解释路径。<sup>③</sup> 这种解释路径的优势在于明晰了影响土耳其外交的各种因素并建立了清晰可证的因果机制,但陷入了“结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的误区,认为土耳其外交的目标、偏好均是给定的,是地区安全结构或体系权力结构的“附属物”。二是将土耳其外交转型视为自我和他者身份互动的结果。<sup>④</sup> 然而,西方理论体系始终身陷“哥伦布综合征”(the Columbus syndrome)之中,即“要么承认自我与他者共在,但拒绝承认世界运行规律的多样性;要么承认世界运行规律的多样性,但将自我以外的他者不断异化”。<sup>⑤</sup> 西方

<sup>①</sup> 相关研究较多,代表性研究参见 Philip Robins, “Turkey’s ‘Double Gravity’ Predicament: The Foreign Policy of a Newly Activist Pow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9, No.2, 2013, pp. 381-397; Burak Bilgehan Özpek and Nebahat Tanrıverdi Yaşar, “Populism and Foreign Policy in Turkey under the AKP Rule,” *Turkish Studies*, Vol.19, No.2, 2018, pp. 198-216; Ariel González Levaggi and Federico Donelli, “Turkey’s Changing Engagement with the Global South,”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7, No.4, 2021, pp. 1105-1124, 等等。

<sup>②</sup> 参见昝涛:《地缘—文明视野下的奥斯曼—土耳其与中亚关系》,《东方学刊》2023年第1期,第60页;昝涛:《从巴格达到伊斯坦布尔:历史视野下的中东大变局》,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版,第355—356页。

<sup>③</sup> Ekrem T. Başer, “Shift-of-axi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Before and During AKP Rule,” *Turkish Studies*, Vol.16, No.3, 2015, pp. 1-16.

<sup>④</sup> Svante E. Cornell, “What Drives Turkish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 Quarterly*, Winter 2012, p. 17; Ayşe Zarakol, *After Defeat: How the East Learned to Live with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11-159.

<sup>⑤</sup> Emilian Kavalski, *The Guanxi of Relational International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 1-2.

视角下国家身份也是“固定的”，身份认同视角下对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原因解释也容易陷入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东方与西方等具有结构性矛盾的观点中。<sup>①</sup>从本质上讲，对土耳其外交的不同解释反映了理性至上的“结果性逻辑”和“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与过程导向的“关系性逻辑”(logic of relationality)之间路径的分野。前两种路径源自西方，相关研究虽然严格遵循外交政策分析的理性逻辑，却忽视了土耳其在西方共同体之外的文化独特性和历史主体性，也没有注意到土耳其自身所处的复杂关系情境。正如秦亚青教授所言，国际关系中的行动者看上去过激的行动实际上是想通过拿捏自我与他者、自我与关系环境之间复杂的关系，以展现自我的存在和实现自我的利益。<sup>②</sup>

就本文的研究对象而言，土耳其本身就处于各种复杂关系、东西方交往进程和不同的(宗教文化、区域政治、军事联盟)情境之中。一是土耳其地跨欧亚两大洲，毗邻巴尔干、中东、高加索等地区，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地缘关系、历史与现实关系错综复杂，土耳其国家及其文化传统始终被这些复杂关系所形塑。二是土耳其脱胎于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最突出特征在于实行差异化与多元性的统治，同时寻求普世文明框架下的身份认同；<sup>③</sup>现代土耳其国家内政外交也始终存在现代化(或称之为“欧洲化”)、民主化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多路进程。三是随着土耳其实力的增强，它不再认为自己是欧洲的一部分，而是试图基于多维地理空间、多重战略目标、多种动员手段、多个合作对象建立差序化复合安全共同体。<sup>④</sup>由此或可追问：土耳其有时看似“鲁莽”的外交行为是否也是复杂关系塑造的结果？本文将运用定性研究方法，基于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及土耳其外交转型研究的相关文献，尝试构建以关系本体论为基础的外交分析新框架，对埃尔多安执政以来的土耳其外交演变做出新解释。

<sup>①</sup> Lisel Hintz, “Take It Outside! National Identity Contestation in the Foreign Policy Are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2, No.2, 2016, pp. 335–361.

<sup>②</sup> 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269 页。

<sup>③</sup> [美]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石炜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9 年版，第 140 页。

<sup>④</sup> 杜东辉：《从大西洋到大周边：土耳其复合联盟战略初探》，《西亚非洲》2022 年第 6 期，第 131—134 页。

## 一、圈层外交分析的理论基础

对世界本初形态的不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所秉持的不同世界观。西方学界普遍认为独立个体构成了世界，而中国则认为关系构成了世界。在个体外推关系的过程中，诸多个体就是其社会关系推出去的圈子中心，“波纹之间的不间断就是过程，条条波纹恰恰是关系的链条”。<sup>①</sup>“关系世界”的理论假定意味着，国家行为体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网络构成了物质结构、制度结构、观念结构之外的第四种体系结构——关系结构。

### (一) 关系结构与关系理论

在关系结构下，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将发生相应转变。首先，关系研究的焦点不是固定在任何特定的个体上，而是聚焦于互动个体之间关系的特殊性质。<sup>②</sup> 其次，关系并不似实体那样固化行为体之间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状态；在关系视角下，差异总是因为情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sup>③</sup> 最后，在关系结构中，行为体通常在既定的关系框架内界定利益、确定利益的实现方式。<sup>④</sup> 因此，相比于物质结构所强调的军事实力、制度结构所强调的议程设置能力，以及观念结构所强调的共有知识，国家在关系结构中的关系认知、关系选择与关系运作显得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关系世界中国家不会再受制于实力大小、盟友/非盟友、内群体/外群体条件的二元局限，反而能够共存于不同的关系环境或关系圈中。<sup>⑤</sup>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间互动模式也会有所不同。例如，国家倾向于考虑其与所有关系圈中成员的关系，但始终优先保持核心圈子

<sup>①</sup>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71页。

<sup>②</sup> Ambrose Yc King, “The Individual and Group Confucianism: A Relational Perspective,” in Donald J. Munro, ed., *Individualism and Holism: Studies in Confucian and Taoist Valu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5, p. 63.

<sup>③</sup> Tamara Townsell, et al., “Recraf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rough Relationality,”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anuary 8, 2019, <https://www.e-ir.info/2019/01/08/recrafting-international-relations-through-relationality/>, 2025-11-02.

<sup>④</sup> 秦亚青等：《关系性逻辑与东亚区域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16页。

<sup>⑤</sup> [意]皮耶尔保罗·多纳蒂：《关系社会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范式》，刘军、朱晓文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2页。

成员之间有凝聚力且牢固的关系。<sup>①</sup> 西安交通大学边燕杰教授认为：在人际社会中，关系本位下社会成员最常见的差异化行为就是“划圈子”，“这个圈子最外围是熟与不熟的圈子，熟人之中是亲与不亲的圈子，核心圈是既熟又亲、再加上义利高度一致而达到的信任”。<sup>②</sup>

国家不仅处于物质世界中，更是被物质世界背后的关系结构形塑。<sup>③</sup> 在关系结构中，国家具有生成性、全息性、转化性、关联性、多维性和圈层性的特征，并可以依据关系选择和关系运作形成不同的关系圈。<sup>④</sup> 人际交往之中关系选择和运作的过程被称为“划圈子”，得到了中国本土社会学的关注，在理论层面发展出了以“差序格局”“人情”“报”为代表的诸多学理表述和人际关系网络中的选择机制。那么，处在关系网络中的国家在面临复杂关系时又会如何运作关系呢？

## (二) 关系圈层与圈层外交

在实体主义视野下，国家所处的环境由客观物质所塑造，权力实力的聚合与分散，往往造就了国家间政治或军事联盟的形成与分化；而在关系主义视野下，国家行为体之间都处于垂直或水平的关系中<sup>⑤</sup>，由此构成了国家之间的不同关系圈层(circles and layers of relationality)。

有关“关系圈层”的概念界定，现有研究中虽未给出清晰的概念框定，但已经对其主要的概念特征进行了初步说明。费孝通先生认为，所谓关系圈如同“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sup>⑥</sup> 费孝通先生的阐述初步说明了关系圈所具有的四重特征：其一，水面如平面，关系圈首先是以横向(水平)视角观察行为体关系网络的分析单元；其二，“石击水、波纹生”的比拟说明，关系圈都是以行为体为中心的，

<sup>①</sup> Yaqing Qin and Astrid H. M. Nordin, “Relationality and Rationality in Confucian and Western Traditions of Thought,”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2, No.5, 2019, p. 608.

<sup>②</sup> 边燕杰：《论关系与关系网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5 页。

<sup>③</sup> Milja Kurki, “Relational Revolution and Relationality in IR: New Conversatio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8, No.5, 2021, p. 831.

<sup>④</sup> 曾向红：《论区域国别学中的焦点—场域法》，《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 年第 5 期，第 65 页。

<sup>⑤</sup> Ye Xue, “China’s Rise, Guanxi, and Primary Institu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36, No.1, 2023, p. 3.

<sup>⑥</sup>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3 页。

或称之为“以自我为中心”；<sup>①</sup>其三，涟漪不止一圈且具有不同的高低起伏，以行为体为中心的关系圈同样是不止一个且是复杂多样的；其四，行为体共存于不同的关系圈之中，换言之，关系圈具有可变多变性。在费孝通先生的波纹理论基础上，秦亚青教授进一步以同心圆的形式定义行为体所处的关系圈（网）：以中心为轴，最近的一圈是内圈，代表血缘关系；第二圈是中圈，表示友谊或伙伴关系；第三圈是外圈，表示陌生人的世界。<sup>②</sup>

不过，费孝通先生对关系圈的阐释仅仅停留于“波纹关系圈”这一相对感性的层面，对其具体内涵不置可否；与之相似的是，秦亚青教授在其著作中对关系圈（网）和关系圈层这两个相似的概念也并未进行区分，这其实在概念理论化层面遮蔽了“圈（网）”和“圈层”这两个概念的不同。<sup>③</sup>需要指出的是，关系格局有其差序性<sup>④</sup>，在差序格局的基础上，后来的学者进一步深挖“差序”概念中的理论内涵，认为“从其（费孝通——笔者注）叙述来看应该包括横向的‘差’和纵向的‘序’……‘差’主要以小家族的规模大小来体现，‘序’主要以伦常的等级体系来表现。”<sup>⑤</sup>这说明在行为体所处的关系网络中，既有横向（水平）层面关系圈不同类型的分异，也有个体在纵向（垂直）层面等级的差异。前者体现了关系圈（circle）的不同，后者则代表了关系圈之内行为体所处等级层次（layer）的不同。

国际关系中已经出现相当多的基于关系圈的外交现象。例如，在以东盟为核心的关系圈层中，从横向层面看最核心的关系圈是东盟 10 国、第二层圈子是包括邻国或东盟的对话伙伴、第三层圈子则涉及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参与者；<sup>⑥</sup>在纵向层面看，东盟居于各方合作机制的领导者地位，发挥了平衡与链接的作用。关系圈同样存在于西方国家中。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制定了被称为“三环”的外交政策：第一环是它领导的大英帝国和英联邦；第二环是美国，这源于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第三环是地理和历史上与英国相连的欧洲

<sup>①</sup> 卜长莉：《“差序格局”的理论诠释及现代内涵》，《社会学研究》2003 年第 1 期，第 25 页。

<sup>②</sup> 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 186—187 页。

<sup>③</sup> 这些表述参见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 161、186 页。

<sup>④</sup> 曹德军：《国际政治“关系理论”，概念、路径与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 年第 2 期，第 42 页。

<sup>⑤</sup> 童星、瞿华：《差序格局的结构及其制度关联性》，《南京社会科学》2010 年第 3 期，第 45 页。

<sup>⑥</sup> Yaqing Qin and Astrid H. M. Nordin, “Relationality and Rationality in Confucian and Western Traditions of Thought,” p. 609.

大陆。<sup>①</sup>

综上,在国家所处的关系网络中,关系圈层在横向层面体现了以不同关系类型划分关系圈,在纵向层面则体现了行为体在不同关系圈内地位等级的差异。国家以自我为参照,依据不同关系圈及关系圈内等级体系差异而采取的不同对外关系策略和对外交往行为,可被称为这一国家的圈层外交(diplomacy under the circles and layers of relationality)。圈层外交强调国家行为体在关系网络中拥有不同的身份角色和关系立场,而不是固化以假定的国家利益或感知的物质能力为前提的互动。<sup>②</sup>因此,相比于既有外交研究倚重对国家利益目标和实力的界定与测量,明晰关系圈层的构成及运作过程是关系视角下国家圈层外交分析框架的重中之重。

### (三) 圈层外交分析的理论构型

在当前国际关系中,国家在数量上相对稳定且会长时间存在,类似于“熟人社会”。<sup>③</sup>在“熟人社会”中,成员之间受到相互义务、权利和非正式保证的约束。当代国家在全球关系网络中生存与互动的关键在于通过持续的关系运作保证彼此之间的关系联系。国家将其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作为外交行动判断标准,并以亲疏远近关系划分出核心圈与非核心圈。<sup>④</sup>核心圈是国家身份认同的主要来源,也是关系经营的重点。不过,这些关系圈的边界是模糊的,行为体完全可以共存于若干群体中,也可以在多种群体中处于游离和自由转换的状态。<sup>⑤</sup>因此,国家之间的关系圈明显区别于攻守同盟,是内嵌于特定的关系背景中而非实力对比中。

如图1所示,在横向层面,国家A可以在国际社会中不断组建和参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国家间关系网络,由此构成以国家A为中心的诸多关系圈。由于关系具有远近亲疏之分,不同关系圈之间也就有亲疏之别,由第一关系圈逐渐

<sup>①</sup> [美]罗伯特·J.利博:《英国:衰落与复兴》,载[美]罗伯特·A.帕斯特:《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杨韵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sup>②</sup> Emilian Kavalski, “Relationality and It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266, June 2016, p. 552.

<sup>③</sup> 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274—286页。

<sup>④</sup> Yaqing Qin and Astrid H. M. Nordin, “Relationality and Rationality in Confucian and Western Traditions of Thought,” p. 608.

<sup>⑤</sup> 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153页。

向外,关系的亲密度(intimacy)和重要性(significance)逐渐降低。<sup>①</sup>以美国的联盟战略为例,美国通过与其盟友签订正式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协定,进而将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分为正式强联盟、非正式强联盟、正式弱联盟、非正式弱联盟四种类型,不同的安全伙伴关系类型意味着美国与其盟友的亲密程度不同、盟友对美国的重要程度亦有不同;这也决定了美国在其盟国安全合作中的战略关注和战略投入具有较大的差异。<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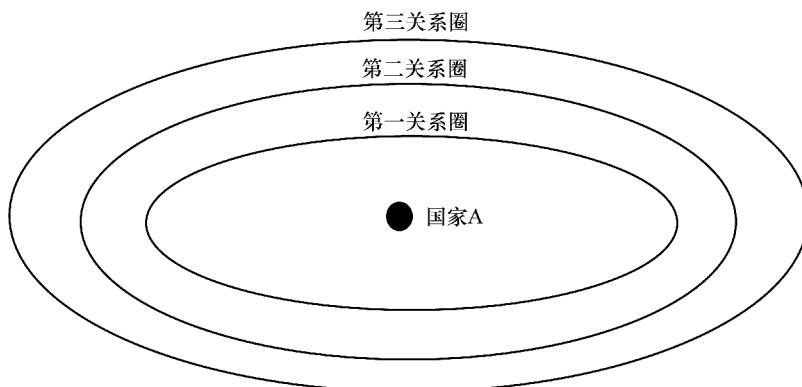


图1 国家“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圈(横向一水平)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在以关系界定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同样会依照关系情境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行为模式。这是因为关系情境将给予国家行为体以共有的关系认同,从而形成以“自我为中心”、多样化、如同心圆般的关系圈。<sup>③</sup>例如,在土耳其与俄罗斯关系中,双方始终处于亦敌亦友的状态中。土俄两国在中东、高加索、乌克兰—黑海这三个不同的区域分别形成了利益交换或关系平衡这两种不同的关系形态,由此构成了两国间的差序互动。<sup>④</sup>同一国家所处关系圈不同、所面对的关系对象不同,则可能有不同的远近亲疏模式。例如,缅甸看守政府在对

<sup>①</sup> 关于关系的亲密度和重要性的相关讨论参见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292—296页; Kwang-kuo Hwang, "Face and Favo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92, No.4, 1987, pp. 944-969; Kwang-kuo Hwang, "Chinese Relationalism: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 Vol.30, No.2, 2000, pp. 168-170.

<sup>②</sup> 孙德刚:《论“准联盟”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第61—78页。

<sup>③</sup> 高尚涛等:《关系认同结构:理论与实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5—9页。

<sup>④</sup> 曾向红、张峻溯:《敌友难分: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差序互动模式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6期,第41—51页。

美、俄、印、东盟四方就分别体现出疏而不离、亲而不近、近而不亲、依而不靠的关系表现形式。<sup>①</sup>

在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中，“差序”是描述关系圈特征极为重要的概念，具有跨学科的应用价值。从理论层面看，用于描述关系圈状态的“差序”概念具有不同的理论意涵。例如，在人际社会中“差序”既可以是基于血缘的亲疏关系，也可以是基于街坊四邻的地缘联系，还可以是基于事缘的动态关系网络。<sup>②</sup> 在构型上，“差序”一词既包含了横向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又包含了纵向的、等级化的“序”。<sup>③</sup> 因此，个体所处的关系圈不仅有横向层面以关系远近亲疏所形成的不同关系情境，更需要考虑纵向层面行为体在不同关系情境中的关系位置及由此导致的地位等级差异。个体身处差序格局，会依据关系的远近亲疏制定运用不同的行动策略，体现出即兴表演而非恪守原则的行为特征。<sup>④</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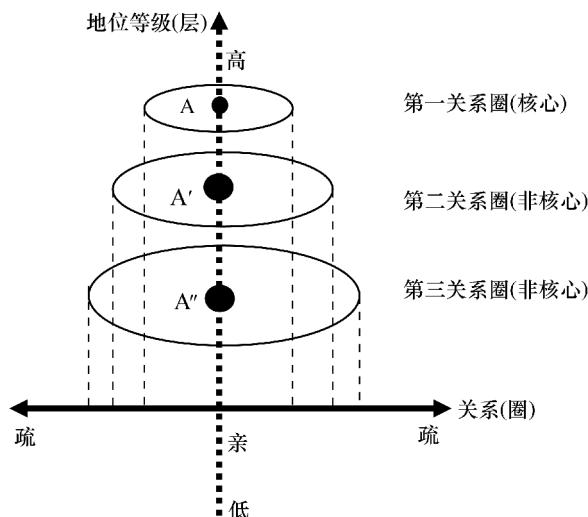


图2 关系圈内的亲疏与地位等级的差异(纵向—垂直)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sup>①</sup> 张添：《国际合法性竞争及缅甸看守政府外交布局的差序与摇摆》，《南亚研究》2022年第4期，第152—153页。

<sup>②</sup> 陈建洪：《哪个我们？如何差序？今天我们怎么理解同心圆意象》，《开放时代》2023年第4期，第121页。

<sup>③</sup> 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第212页。

<sup>④</sup> 曾向红：《论区域国别学中的焦点—场域法》，第64页。

如图 2 所示,如若将横向一水平方向的国家关系圈进行纵向一垂直方向的立体展开,可以发现,除了每一层关系圈具有远近亲疏的分异之外,国家 A 在不同的关系圈中同样可能具有不同的地位差异,从点 A 到点 A”,显示出同一国家 A 在不同的关系圈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地位等级。这是因为在不同的关系圈中,行为体可以占据多种关系位置、拥有不同的身份地位。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尼克·克罗斯利(Nick Crossley)所言,行为体总是处在“关系网络内部的‘位置’上……并且只是作为这些关系位置的行动者而行动”。<sup>①</sup>因此,在关系结构中,国家表现出的立场和行为是相对于特定关系和特定关系者而定的,并不是西方研究中所预设的超然的理性权衡。<sup>②</sup>

针对圈层外交的理论构型,有必要在此进行几点说明:第一,关系本体论之下,国家处于不同关系圈层中,身份与特性由彼此间的关系连接所界定并始终处于生成流变状态;<sup>③</sup>第二,时空差异并不削弱关系连接的力量,这些跨越时空的关系类型分别使特定的关系参与者“社会化”,并将这些关系在不间断时间的交叉点上联结起来;<sup>④</sup>因此,在圈层外交的理论模型中,不同关系圈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统一于国家历史与现实之中;第三,国家身处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因而可能参与或组建远多于三层的关系圈;第四,国家在关系圈内地位等级的高低与关系圈的亲疏程度并不成必然的正相关关系,需要依据不同情境加以判断。

## 二、圈层外交分析的理论机制及比较价值

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强调,关系的性质定义了国家行为体行动的适当性;国家在没有清楚认识到一段关系根本性质的情况下,并不知道其在进行外交决策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范。<sup>⑤</sup>因此,圈层外交分析的重点是国家对其所面

<sup>①</sup> [英]尼克·克罗斯利:《走向关系社会学》,刘军、孙晓娥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8—20 页。

<sup>②</sup> 秦亚青、付清:《关系转向与关系主义世界政治理论:基于中西学理对话和比较视角的分析》,《国际观察》2023 年第 6 期,第 27 页。

<sup>③</sup> 曾向红:《论区域国别学中的焦点—场域法》,第 57—58 页。

<sup>④</sup> Chih-yu Shih, “Role and Relation in Confucian IR: Relating to Strangers in the States of Nat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48, No.5, 2022, p. 929.

<sup>⑤</sup> Yaqing Qin and Astrid H. M. Nordin, “Relationality and Rationality in Confucian and Western Traditions of Thought,” p. 610.

对的复杂关系进行判断和选择。在阐明本文理论基础后,这一部分将进一步说明国家外交中的关系圈层如何形成、圈层外交如何运作,以及圈层外交分析相较于层次分析法的理论价值。

### (一) 关系圈层的形成路径

从零散的诸多关系演变成为相对固定的关系圈层,需要同一类型关系的长时间稳定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共鸣、冲突和相互关联是人们理解社会空间内各种互动过程的重要方面。<sup>①</sup> 在人际社会中,情感最为稳定的一种类型就是亲缘,它通常以血亲或友谊为基础,同宗族、同姓氏甚至同乡的人都会因为某种程度上的亲缘认同而逐渐形成相对封闭、彼此互助的关系圈。<sup>②</sup> 在国际关系中,随着封建帝国的衰落和民族国家作为新的国家组织方式不断兴起,人际关系中的血缘因素(如欧洲皇室的联姻等)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逐渐减弱;不过,国家内部存在单个或多个民族,民族作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sup>③</sup>,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人际关系中的家族关系,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甚至语言文字<sup>④</sup>都可能成为国际关系中被相关国家所认可的亲缘联系之一。例如,部族、族裔、教派等因素至今仍然是一些阿拉伯国家维系政治关系的主要纽带,由此形成与差序结构类似的“同心圆”式的政治认同,沿着“家庭—部族—部落联盟—国家”的方向依次外扩展。<sup>⑤</sup>

在亲缘因素之外,影响行为体间关系圈层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地缘因素”。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针对关系圈所形成的地缘因素做过极为精辟的论述:“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为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一两家。”<sup>⑥</sup>在人类社会的文明交往进程中,地缘环境是文明起源和发展的支撑性条件,并与血缘文明相互依

① 刘思达:《社会空间:从齐美尔到戈夫曼》,《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4期,第158页。

② 边燕杰:《论关系与关系网络》,第174—176页。

③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④ 语言相似性促进群体认同倾向,参见 Theresa Matzinger, et al., “Linguistic Preference Outcomes Aligns as a Predictor for Assessing Others’ Cooperativeness,” April 18, 2023, [https://osf.io/pre-prints/psyarxiv/pbdxm\\_v1](https://osf.io/pre-prints/psyarxiv/pbdxm_v1), 2025-11-2。

⑤ 田文林:《阿拉伯世界权力更替的内在逻辑》,《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7期,第48页。

⑥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34—35页。

存。<sup>①</sup> 对国家而言,其所处的地缘位置通常是固定的且不易轻易改变的;领土接壤、海域毗邻等地理层面的联系通常也会构成国家独特的关系圈层。就地缘政治层面的因素而言,国家同样处于不同的圈层结构中:最高一层是地缘战略辖区,服务于重要大国及其战略需要;第二个层次是地缘政治区,由地理的毗邻性及政治、文化、军事互动相连接;第三个层次处于边缘的破碎地带,是与其他域外国家争夺的地区。<sup>②</sup> 由此可见,相较于国家所“面临”的亲缘联系,地缘因素更多地体现了地理环境和国家实力的决定作用。综上,地理环境决定了国家与谁能构成地缘联系,国家实力则决定了国家地缘范围延伸的大小。

如果从社会互动论的视角看,则会发现促成国家关系圈层形成的第三个因素——历史和过往经验。关系圈层类似于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的“场域”(field)。在布尔迪厄看来,场域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空间,“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sup>③</sup>所有场域都是关系性的,因为“存在着行动者,才有了行动,有了历史,有了各种结构的维续或转换”。<sup>④</sup> 与关系圈类似,场域的边界是模糊的,行为体可以在不同场域处于一种被布尔迪厄称为“游戏”(game)的状态中。不过,场域会随着历史关系的变动而出现改变,其原因在于“历史性关系到场域的塑造、运作以及维持与适应它所需要的知识范畴”。<sup>⑤</sup> 对于身处场域中的行为体而言,作为历史产物的惯习(habitus)仍会与场域彼此互构。<sup>⑥</sup> 惯习与行为体之间、行为体与场域之间的互构过程体现了“结构的二重性”,<sup>⑦</sup>其实质仍然是行为体与结构之间的关系互动。

国际社会同样是一个多元场域,各国作为其中的行为体分别占有不同比例的经济、文化、社会和符号资本,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竞争和博弈。场域的形

<sup>①</sup> 彭树智:《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观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7—18 页。

<sup>②</sup> [美]索尔·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严春松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1—50 页。

<sup>③</sup> [法]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15—16 页。

<sup>④</sup> 转引自[法]布尔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第 18—19 页。

<sup>⑤</sup> [爱尔兰]帕特丽夏·汤姆森:《场域》,载[英]迈克尔·格伦菲尔:《布迪厄:关键概念(原书第 2 版)》,林云柯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7 页。

<sup>⑥</sup> 毕天云:《布迪厄的“场域—惯习”论》,《学术探索》2004 年第 1 期,第 33—34 页。

<sup>⑦</sup>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纲要》,李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3—26 页。

成与演变不可避免地受到历史关系的束缚,行为体所持有的惯习也部分地来源于历史和过往经验。曾经的交往传统、历史记忆通常会影响国家行为体在不同场域背景下的行为偏好,并形成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关系的各个部分在空间(场域或称关系圈层)和时间(历史与现实)整体中占据不同的位置,由此形成了国家行为体外在表现的独特差异。<sup>①</sup>

至此,本文初步提出了国家关系圈层形成的三种主导性关系因素:亲缘、地缘和历史。对于由亲缘因素所形成的关系圈层来说,民族、宗教、语言甚至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相似性都能够构成国家间亲缘的一致想象;国家在亲缘关系圈中考虑关系的亲密度多于关系的重要性,甚至可能出现只考虑亲密度不考虑重要性的现象。对于由地缘因素所形成的关系圈层来说,地理空间上的毗邻、国家实力的有效投射范围决定了地缘圈层能否形成及其范围大小;一般而言,国家在地缘圈层中着重考虑彼此间的重要性而非亲密度。对于由历史形成的关系圈层来说,曾经的交往传统或历史记忆会对国家外交行为产生影响。<sup>②</sup>不过,国家间历史的演进复杂曲折,故国家在该圈层中可能兼具考虑关系的亲密度和重要性。

表1 外交关系圈层形成的主导性因素

关系圈层的形成	主导性因素	判断标准
	亲缘	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的相似性
	地缘	地理毗邻和国家实力
	历史	交往传统和历史记忆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上述三种主导性关系因素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很可能有其二或兼有之。例如,在中国与越南的关系中,既受到“同志加兄弟”亲缘因素的影响,又受到“山水相连”地缘因素的影响,同时也有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朝贡联系。因此,中越之间不同关系圈层相互交织,两国关系中的亲密度和重要性程度也在不同的关系圈层中表现不一。在这种情况下

<sup>①</sup> Chengxin Pan, “China’s Rise as Holographic Transition: A Relational Challenge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tonian Ontology,” in Chengxin Pan and Emilian Kavalski, eds., *China’s Rise and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roydon: Bristol University Press, 2022, p. 217.

<sup>②</sup> Kathrin Bachleitner, “Diplomacy with Memory: How the Past Is Employed for Future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15, No.4, 2019, pp. 492-508.

下,两国间关系的经营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双方交往时出现不同关系圈层中亲密度和重要性的错位,那么则会极易导致双边关系危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所提出的中越之间“不对称关注”就是典型案例。<sup>①</sup>

## (二) 国家在关系圈层中的行为逻辑

如前所述,国家在不同的关系圈层中将会具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关键在于如何判断导致不同行为模式的影响性因素及其奉行的行为准则。在此,主要借用中国台湾大学黄光国教授所区分的三种关系类型对此加以讨论。黄光国以社会交换理论为基础分别区分了情感性关系(expressive tie)、工具性关系(instrumental tie)、混合性关系(mixed tie)。他认为,人际社会中当在经营不同关系时,常常依据三种法则来进行社会交换或分配社会资源。<sup>②</sup> 情感性关系通常是一种历时较久且相对稳定的关系类型,主要体现在家庭、密友这类血缘或亲缘关系中;在情感动机的驱使下,每个成员按照“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几乎不寻求其他成员的回报。工具性关系通常与情感性关系相对。在此关系中,行为体之间几乎没有情感的维系,也不希望发展任何情感性联系;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其所需要的利益或物质目标,因此,行为体之间讲究利益的对等交换,因此被称为“公平法则”。混合性关系处于情感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的中间水平。混合性关系区别于上述两种关系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强调关系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混合性关系虽然一般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但是交往双方期待且预期他们在未来可能进行情感性交往,因此,必须借助礼尚往来、“投桃报李”的方式加以维系,故称之为“人情法则”。<sup>③</sup>

由此可见,在由亲缘所构成的情感性关系中,行为体只以亲缘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一旦行为体之间的亲缘联系得以确立,“需求法则”便发挥作用,具有亲缘联系的行为体之间几乎会“有求必应”。由此可以推论:<sup>④</sup> 在

<sup>①</sup>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77-92.

<sup>②</sup> 黄光国、胡先缙:《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sup>③</sup> Kwang-Kuo Hwang, *Foundations of Chinese 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 New York: Springer, 2012, pp. 88-95.

<sup>④</sup> 三个推论将主要基于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常用假定,即“国家也是人”。国家的人格化假定虽然备受争议,但确实有利于研究者建构理论,参见 Alexander Wendt, “The State as Person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30, No.2, 2004, pp. 287-292。

以亲缘因素所构成的关系圈层中,国家外交行为也将遵循“需求法则”,该圈层之下国家间情感联系及关系的亲密度将成为影响国家外交行为的决定性因素(推论1)。工具性关系强调行为体之间利益的等价交换,行为体在此关系中通常会仔细权衡成本与收益,做出最符合工具理性的选择。从博弈论视角看,处在工具性关系中的行为体通常将彼此间的互动看作是单次博弈,因此,工具性的利益交换在双边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混合性关系也可被视为一种“熟人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行为体之间相互协助,资源支配者与其他行为体之间形成了较为良好的利益互惠关系。<sup>①</sup>不过,如果资源支配者仍然以“公平”作为行为准则,忽视双方在过去所积累的“情面”,拒绝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那么,双方关系则可能面临危机。<sup>②</sup>长此以往,一方对另一方的角色期待降低、信任受损<sup>③</sup>,双边关系极易从混合性关系退化为工具性关系(推论2)。在关系圈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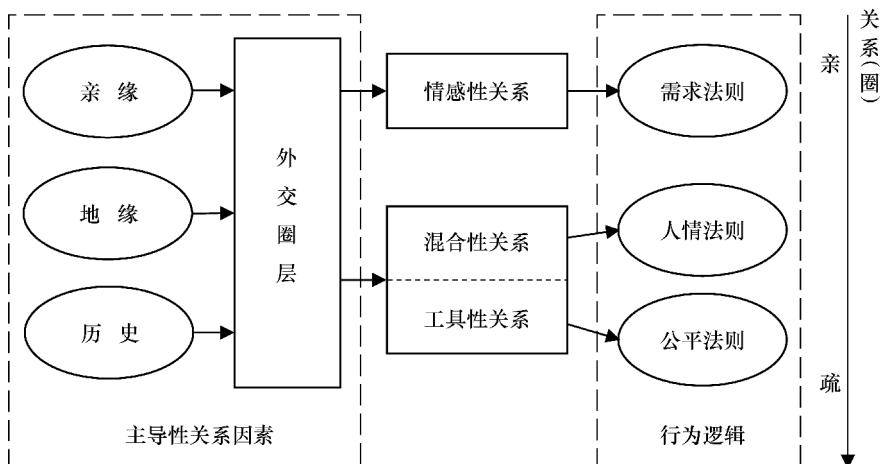


图3 国家开展圈层外交的行为逻辑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的形成过程中,地缘和历史这两种关系性因素同时将亲密度和重要性这两个指标纳入考虑的范围,这也意味着国家行为体在进行关系判断时将进行权衡,从而选择最优关系策略。因此,在以地缘和历史为主导性因素所形成的外交

① 利益交换及回报的讨论参见杨美惠,《礼物、关系学与国家:中国研究者与主体性关注》,赵旭东、孙珉合译,张跃宏译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131页。

② 黄光国、胡先缙,《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第10—11页。

③ 有关角色期待与信任的关系研究,参见何友晖等:《世道人心:对中国人心理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5—136页。

圈层中,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并存,国家行为体的行动逻辑既可能遵循等价交换的“公平法则”,也可能遵循礼尚往来的“人情法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推论3)。从情感关系到混合性关系再到工具性关系,体现了国家关系圈由亲到疏的变化。

### (三) 圈层外交分析的横向比较及其价值

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国家间行为的“分层”研究经久不衰。早在1959年,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就在其著作《人、国家与战争》中系统梳理国家间战争的爆发根源,提出了个人、国家、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的基本“意象”(image)。<sup>①</sup>后来学者接续研究,开拓了国际关系中层次分析法的理论深度和研究广度。<sup>②</sup>就本文的研究而言,构建解释框架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相关方法。但是,本文所构建的圈层外交分析框架与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法并不等同。

第一,本体论基础不同。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法构成了结构现实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基础,就此而言,层次分析的本体论基础仍然是实体主义本体论。在层次分析法之下,国际关系中的解释性因素虽然得到了相应的区分,被依次划分为世界系统、国际关系、国内社会、政府、决策者角色、决策者个体等诸多不同的部分;<sup>③</sup>但其本质上仍然关注的是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中如原子般的行为个体,这些个体由物质结构形塑,忽视了其背后所蕴含的关系性因素。

第二,解释的路径不同。层次分析法建立在实体主义本体论基础之上,这也意味着该方法对待个体的划分是颇为宏观的,通常是人为地将不同因素区分开,忽视了层次与层次之间的互动性。<sup>④</sup>反观圈层外交分析,则可以发现不同关系圈层之间是相互贯通,这依赖于部分与整体之间关系全息性(hologra-

<sup>①</sup>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1959.

<sup>②</sup> J. David Singer, “The Level-of-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orld Politics*, Vol.14, No.1, 1961, pp. 77-92; James Rosenau,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Frances Pinter, 1980, pp. 116-170.

<sup>③</sup> Bruce Russett and Harvey Starr, *World Politics: A Menu for Choice*, New York: W. H. Freeman, 1992, pp. 10-18.

<sup>④</sup> 蒋家敏:《重新审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分析层次问题》,《南大亚太评论》2022年第1期,第288页。

phy)的转换。<sup>①</sup>这好比“藕断丝连”——层次分析法只是将一节藕用刀切成若干藕片,每一片藕都可以作为整节藕的充分性解释;而圈层外交分析则在藕片的基础上另外关注到了不同藕片之间的藕丝,也就是“关系”,并以此解释整节藕的存在。

第三,个体在分析层次之间的作用不同。由于不同层次之间处于相互孤立的二元状态之中,层次分析法虽然有助于发现解释性因素或因果机制,但却不易构建较为宏大的理论框架。<sup>②</sup>对圈层外交分析而言,个体在不同层次之间彼此孤立的状态被打破,其不同关系圈层之间借助个体时间或空间上的关系相互联结,从而构成了以差序状态为基础的、不同圈层之间联系的纽带。不同个体之间、不同圈层之间、圈层与诸多个体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从而形成了可相互转换的关系场域。在圈层之下,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成为分析的中心,也可作为圈层分析的节点;个体是关系圈层之下的个体而不是自在的个体。恰如秦亚青教授所言,“关系圈网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常数,而是随着时间 and 情势变化而变化的”。<sup>③</sup>个体既可以是自我关系圈层的中心,亦可成为其他关系圈层的节点之一。

不可否认的是,圈层外交分析与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法确有相似之处,如二者都试图通过“层化”的方法将复杂的国际关系事实具象化<sup>④</sup>,从而为我们的观察和解释国际政治现象提供便利。当然,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如何对待个体与不同“层”的关系、不同“层”之间及其与整体之间的关系。相较于层次分析法,圈层外交分析的创新之处在于打破了传统层次的静态理论结构,代之以关系的全息转换和一体多维的分析架构。

---

<sup>①</sup> Chengxin Pan, “Enfolding Wholes in Parts: Quantum Holograph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6, No.1, 2020, pp. 14-32.

<sup>②</sup> 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欧洲》1998年第3期,第9页。

<sup>③</sup> 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第270页。

<sup>④</sup> 尚劝余:《国际关系层次分析法:起源、流变、内涵和应用》,《国际论坛》2011年第4期,第53页。

表 2 层次分析法与圈层外交分析的比较

层次分析法		圈层外交分析	
不同	本体论基础	实体主义	关系主义
	个体与“层”的关系(认识论基础)	个体和“层”之间彼此孤立，构成相对独立的因果机制	个体与“层”处于可相互转化的关系网络中
	方法论路径	偏重解释因素的宏观划分	强调整体一部分、自我—他者关系的全息性转换
相似		“层化”分析思路、明确不同的解释因素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 三、土耳其的圈层外交及其行为模式

土耳其地处欧亚十字路口，面临宗教、文化、地缘等多重关系的选择。<sup>①</sup>就此而言，土耳其的综合国力虽然“比上不足”，但是它在世界政治中所具有的关系性权力却不可小觑。国家外交的圈层分析框架既能够契合土耳其现实所处的诸多关系情境，又有助于厘清以土耳其为中心的诸多关系圈层之间的关系。

#### (一) 土耳其外交中关系圈层的形成

从历史上看，土耳其脱胎于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在土耳其历史中有三重维度：首先，它是一个土耳其人的国度，根植于“土耳其斯坦”的部落社会文化；其次，奥斯曼帝国的基础并非一种民族特征，而是穆斯林之间的手足之情以及对伊斯兰宗教体系的崇敬之情；最后，在土耳其民族认同之上，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实现了“奥斯曼治下的和平”。<sup>②</sup>从历史到现实，英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贝尔福(Patrick Balfour)所区分的奥斯曼帝国“三层历史”可以为审视当代土耳其外交关系圈层提供参照。

<sup>①</sup> Bahar Rumelili, “Turkey: Identity, Foreign Policy, and Socialization in a Post-Enlargement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33, No.2, 2011, p. 246.

<sup>②</sup> [英]帕特里克·贝尔福：《奥斯曼帝国六百年》，栾力夫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版，第 753—754 页。

一是土耳其的文化及身份认同问题。奥斯曼帝国对现代土耳其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所谓的“土耳其斯坦”和伊斯兰教文化。尤其在土耳其国家的构成问题上，“大土耳其民族”和伊斯兰教的信仰，构成了当代土耳其最为主要的国家认同。<sup>①</sup> 总统埃尔多安也在数次演讲中指出：“（‘土耳其斯坦’）开始唤起一片土地——安纳托利亚，命名了它的范围，提到了它的人民（仅穆斯林）……”<sup>②</sup> 实际上，土耳其国家的身份认同本身就是一个内外不分、伸缩自如的关系圈：对内而言，土耳其国家认同首先是对生活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民族的认同；但随着奥斯曼帝国的扩张，这种认同的范围曾在短暂“外溢”至地中海沿岸的广大地区；对外而言，正发党政府对“大土耳其民族”的想象还包括散布于欧亚大陆上的原属突厥语系的民族，对伊斯兰教的信仰则主要表现为支持现代伊斯兰思潮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势力。<sup>③</sup>

在土耳其国家政治发展的进程中，始终受到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超国家认同”的影响。<sup>④</sup> 宗教和民族这类亲缘认同在一定程度上使土耳其的国家意识有着更加灵活的“边界”，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解土耳其国家利益的模式。<sup>⑤</sup> 以想象中的民族、宗教、语言的相似性为基础，土耳其构建了一个有着大致范围且边界灵活可变的亲缘圈层(circles and layers of cognation)，主要包括：土耳其、“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和突厥语国家，其范围主要包括中东、高加索、中亚三个地区。亲缘圈层的外延还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国家。

二是土耳其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关系问题。在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维系土耳其国家生存最主要的一个原则是“将属国和边境省份作为直辖区域的屏障，避免战争带来的外部(即外国)干涉”<sup>⑥</sup>，借以维持内部的和平与稳定。近代

<sup>①</sup> Jenny White, *Muslim Nationalism and the New Turk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

<sup>②</sup> Etienne Copeaux,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Masks of Violence,” in Stephan H. Astourian and Raymond H. Kévorkian, eds., *Collective and State Violence in Turkey: The Construction of a National Identity from Empire to Nation-State*,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2020, p. 473.

<sup>③</sup> 刘中民、赵跃晨：《“博弈”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第84—85页。

<sup>④</sup> 刘中民、曾卓：《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外交评论》2023年第1期，第131—132页。

<sup>⑤</sup> Jenny White, *Muslim Nationalism and the New Turks*, p. 19.

<sup>⑥</sup> [日]林佳世子：《奥斯曼帝国：五百年的和平》，钟放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264—265页。

以来,土耳其所遭受的屈辱历史表明,域外大国对土耳其周边地区的介入,是导致土耳其国家分裂的重要威胁。<sup>①</sup> 不过,土耳其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并不取决于土耳其与周边国家本身,而是与域外大国的博弈和介入息息相关。首先,冷战后的 20 年,中东国家对域外国家依赖程度之高、域外大国对中东事务的介入程度之深,使得全球和地区权力体系变化与中东国家制衡行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sup>②</sup> 其次,黑海和高加索地区地处俄罗斯近邻地区,始终被俄罗斯视为其势力范围;<sup>③</sup> 土耳其与希腊、塞浦路斯在东地中海地区既存在领土争端,又有当地土族与希族、塞族人的民族纠纷。然而,希腊与塞浦路斯的背后是欧洲国家,土耳其与希塞两国的争端烈度直接影响了西方对土耳其的接受程度。<sup>④</sup> 最后,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以沙特、以色列等传统盟友为抓手,掀起长达 10 余年的中东大变局,形成了“伊斯兰国”恐怖主义、库尔德分离主义、叙利亚难民危机等诸多地区问题,这些安全问题凭借土耳其自身和地区国家力量都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在其毗邻的四个周边次区域中,土耳其虽力图成为其周边地区的“中心国家”,但事实证明相关地区局势的复杂程度远超土耳其自身能力的控制。美俄欧等域外势力的介入和牵制使得土耳其周边外交目标常常难以实现。<sup>⑤</sup> 在中东和欧亚变局之下,黑海、高加索、东地中海、中东这四个地区对土耳其的重要性凸显,形成了土耳其外交中的地缘圈层。不过,土耳其在地缘圈层内的外交行为常常受制于与域外大国的关系,这构成了分析土耳其地缘圈层(circles and layers of geopolitics)的研究主线。

三是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历史遗产的关系问题。当代土耳其建立在奥斯曼帝国的断壁残垣之上,有着一种名为“呼愁”<sup>⑥</sup>的民族情绪,体现了一

<sup>①</sup> Umut Can Adisonmez, “Governing Anxiety, Trauma and Crisis: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n Ontological (In)Security after the July 15 Coup Attempt in Turkey,”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29, No.3, 2020, pp. 291–306.

<sup>②</sup> 谢立忱、齐淑杰:《制衡视角下的中东国际关系史研究》,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34 页。

<sup>③</sup> M. Hakan Yavuz and Vasif Huseynov, “The Second Karabakh War: Russia vs. Turkey?” *Middle East Policy*, Vol.27, No.4, 2020, p. 110.

<sup>④</sup> [英]阿诺德·汤因比:《文明的接触: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张文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53—81 页。

<sup>⑤</sup> 邹志强:《土耳其周边外交中西亚土库曼人的角色与影响》,《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89 页。

<sup>⑥</sup> 《古兰经》中曾写作“huzun”和“hazan”,有“忧愁”之意。

种建立在“帝国废墟上的集体记忆”。<sup>①</sup> 2008年金融危机后,土耳其国内对奥斯曼帝国的怀旧情绪有增无减,其对外战略的特点也被西方学者称为所谓的“新奥斯曼主义”:在情感维度上,正发党利用对奥斯曼帝国历史情感的“怀旧”,唤起了民众心中对土耳其社会发展的信心和埃尔多安执政的认同;在现实维度上,以原奥斯曼帝国在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遗产为工具,土耳其保守派精英创造了一种替代性的国家身份,其政治愿景被称为“新土耳其”。<sup>②</sup> 在“帝国怀旧”思潮的影响下,总统埃尔多安在2010—2016年间频繁造访奥斯曼帝国领域内国家,甚至在公开的外交演讲时宣称:“我们都曾是奥斯曼帝国的子孙!”<sup>③</sup>

奥斯曼梦中未来的愿景为奥斯曼帝国提供了合法性与正当性,也为当下的土耳其共和国提供了“建国神话”。<sup>④</sup> 在土耳其国内社会出现“帝国怀旧”思潮的情况下,总统埃尔多安及正发党借助民众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怀恋,将实现所谓“土耳其梦”与恢复“奥斯曼帝国荣光”联系起来,以此为其外交政策“正名”;时任土耳其外交部长达武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甚至声称:“我们不能假装奥斯曼帝国从未在这些地区存在过”<sup>⑤</sup>,“土耳其将密切关注以前由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土地”。<sup>⑥</sup> 以600余年的历史过往为基础,历史上奥斯曼帝国领域内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东地区、北非—红海沿岸、地中海—黑海沿岸、巴尔干地区、高加索地区——构成了土耳其外交话语和行动中的帝国圈层(circles and layers of empire)。

① [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伊斯坦布尔:一座城的记忆》,何佩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5—102页。

② Umut Uzer, “Conservative Narrative: Contemporary Neo-Ottomanist Approaches in Turkish Politics,”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29, No.3, 2020, p. 276.

③ Edward Wastnidge, “Imperial Grandeur and Selective Memory: Re-assessing Neo-Ottomanism in Turkish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tics,” *Middle East Critique*, Vol.28, No.1, 2019, p. 13.

④ [英]卡罗琳·芬克尔:《奥斯曼帝国1299—1923》,邓伯宸等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版,第581页。

⑤ Balkan Insight, “Davutoglu: ‘I’m Not a Neo-Ottoman’,” April 26, 2011, <https://balkaninsight.com/2011/04/26/davutoglu-i-m-not-a-neo-ottoman/>, 2025-11-2.

⑥ M. Hakan Yavuz, *Nostalgia for the Empire: The Politics of Neo-Ottoman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186-187.

表3 土耳其外交中的关系圈层划分

主导性关系因素	关系类型	圈层类型	主要所属范围	关系圈的亲疏
亲缘	突厥语系、宗教	亲缘圈层	高加索、中东、中亚	核心
地缘	地理毗邻、现实利益	地缘圈层	黑海、高加索、东地中海、中东	非核心
历史	奥斯曼帝国历史	帝国圈层	中东、北非—红海、黑海、巴尔干、高加索	非核心

备注：“□”代表该地区为多圈层复合地带。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如表3所示，亲缘圈层、地缘圈层和帝国圈层所属范围虽有不同，但大致包含了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外交所涉及的主攻方向。就亲疏关系而言，以突厥语系和宗教意识形态为基础所形成的亲缘圈层居于土耳其外交的核心地位；由地缘战略位置和现实利益所形成的地缘圈层、源自奥斯曼帝国历史所形成的帝国圈层则分别居于土耳其外交的非核心地位。地缘圈层的主要范围虽然是土耳其大周边地区，但是受欧美俄三方影响较大。中东变局以来，土耳其入欧受阻、叙利亚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均牵涉土耳其与美欧和俄罗斯的多方博弈。因此，下文对地缘圈层的关系分析将主要从欧美与俄罗斯这两个方面着手。在土耳其外交的关系圈层中，中东、黑海和高加索这三个次区域属于关系圈层复合地带。土耳其在这三个地区的运作将同时受制于三种关系因素的限制，其中，关系判断与选择将直接关乎土耳其与这两个地区内有关国家关系的好坏，考验土耳其在俄美欧三方及地区国家间的关系平衡技巧。

## (二) 不同关系圈层下土耳其外交的行为模式

**1. 亲缘圈层：突厥语国家与“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1991年苏联解体后，面对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国家的独立，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成为土耳其介入欧亚事务的主要抓手。埃尔多安上台后更为强调土耳其外交中的突厥语系各民族、伊斯兰教宗派元素<sup>①</sup>，亲缘圈层内国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土耳其的支持下，突厥语国家曾举办多次领导人峰会，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能源、安全多维度的合作机制。未遂军事政变后，随着土耳其与美西方关系的

<sup>①</sup> M. Hakan Yavuz,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Neo-Ottomanism: Searching for a Post-National Vision,” *Die Welt Des Islams*, Vol.56, No.3-4, 2016, p. 443.

不断恶化,强化突厥语国家间合作成为彰显土耳其与西方和俄罗斯“平起平坐”的重要政策工具。2021年11月,“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更名为“突厥语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Turkic States),开启突厥语国家之间新一轮政治、经济与安全合作。土耳其的外交话语也发生了转变。土耳其对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常常以“兄弟国家”相称,以此体现所谓民族的亲缘特征。<sup>①</sup> 正发党对其国内意识形态领域也进行了修正,企图将国内民众对“大土耳其民族”的认同与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进而重塑土耳其国家内政外交的主导意识形态。例如,正发党主导下的政治话语抛弃了“安纳托利亚家园”的说法,转而强调“土耳其人在中亚里海沿岸建立了一个辉煌的城市文明……穿越欧亚大陆迁徙……为当地(指中亚地区——笔者注)人民提供了民主治理、性别平等、世俗主义和宗教宽容等理念”。<sup>②</sup> 借助“大土耳其民族”的历史叙事重构,土耳其与突厥语国家形成了人为构建的亲缘关系。

2011年后,土耳其在中东地区支持地区穆兄会势力,开展“宗派主义”外交。一方面,中东变局使土耳其看到政治机会,在中东地区力推其主导的“土耳其模式”;<sup>③</sup>另一方面,土耳其开始在伊斯兰意识形态、国家发展模式、地区主导权等方面与沙特、伊朗展开竞争。土耳其主推的“温和伊斯兰民主”与穆斯林兄弟会所宣扬的意识形态具有相似性,土耳其遂成为穆斯林兄弟会的坚定支持者。这为土耳其与沙特、伊朗两大地区对手之间的博弈团结了一批“盟友”,逐渐形成了以土耳其为中心的“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其中,以土耳其为中心形成了不同层级的弱链式联盟:土耳其居于第一层级,卡塔尔处于第二层级,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等非国家行为体则处于第三层级。<sup>④</sup> 从推进突厥语国家联合到组建“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土耳其在亲缘圈层内的外交行动由疏到密。随着中东变局后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急剧恶化,土耳其“向西看”的外交策略遭遇困境,亟须通过其他方式彰显自身“大国”地位,凝聚国内民众对“土耳其梦”的信心。在此背景下,突厥语国家关系圈以及在中东地区角逐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就成为土耳其摆脱亲西方外交,彰显其所谓“大国自主

<sup>①</sup> İbrahim Karataş, “The Discourse of Brotherhood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AK Party Era,” *Üsküdar Üniversitesi Sosyal Bilimler Dergisi*, sayı: 12, 2021, pp. 48–56.

<sup>②</sup> Etienne Copeaux, “Nationalism and History, Masks of Violence,” p. 464.

<sup>③</sup> 李秉忠:《“中东波”以来土耳其外交的调整》,《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4期,第51—55页。

<sup>④</sup> 孙德刚、凌胜利:《多元一体:中东地区的弱链式联盟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1期,第69页。

性”的主要着力点。<sup>①</sup>

在亲缘圈层之下，土耳其外交逻辑主要遵循“需求法则”，即对亲缘圈层内的国家的需求不计成本、几乎有求必应。这在土耳其外交中突出表现是：2013年7月，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权，土耳其“亲穆兄会”外交遭遇严重挫折，即便如此，土耳其也并未改弦更张，反而通过各种外交场合作向埃及军政府施压，声援穆兄会势力；在2017年6月卡塔尔断交危机中，土耳其力挺卡塔尔，不惜突破禁运禁令向驻卡塔尔军事基地增派武装人员以示支持；在2020年9月纳卡地区冲突中，土耳其一边倒地向阿塞拜疆提供军事援助，无视国际社会劝和努力，声援阿塞拜疆“收复领土”。同时，土耳其还在埃及、利比亚、也门、北塞浦路斯扶植“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的次国家代理人，在中亚大举推进突厥语国家一体化进程。从国家实力的角度分析，土耳其在这些地区“四面出击”，似乎不断透支其战略信誉和战略实力，是典型的“鲁莽”行为；但若从关系视角看，这仅是土耳其对亲缘圈层下国家的合理支持。

**2. 地缘圈层：土耳其与美俄欧在周边地区的互动。**在亲缘圈层之外，土耳其与美俄欧三方所构成的地缘圈层则处于非核心地位。在非核心关系圈中，实现有效利益交换是行为体之间的主要目标。在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关系中，彼此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平等。在冷战期间，土耳其不断尝试在经济和军事上融入西方阵营，并于1952年加入北约。不过，这一时期土耳其与美欧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单纯的利益交换关系，即西方国家给予土耳其“欧洲化”和所谓“西方盟友”的入场券，土耳其则为西方国家守卫与苏联的意识形态“边境”。因此，冷战期间土耳其与美欧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工具性关系。至少对西方世界来说，土耳其能否成为“西方国家”并不重要，应对共同的敌人苏联才是土耳其与美欧最重要的目标。

由于多年来入盟谈判以及国内政治民主化改革，土耳其已经与西方世界建立了相当多的制度性联系，并被西方盛赞为一个“有效地整合伊斯兰教与民主，且经济充满活力的样板”。<sup>②</sup>这意味着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互动已经不仅局限于冷战时期的工具性关系，而是通过多元化的经济、政治联系进化为某种程度上的混合性关系。因此，这一时期美欧与土耳其的互动应遵循“人情法

<sup>①</sup> Ekrem T. Başer, “Shift-of-axis in Turkish Foreign Policy: Turkish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Before and During AKP Rule,” *Turkish Studies*, Vol.16, No.3, 2015, p.5.

<sup>②</sup> Landon Thomas, “In Turkey’s Example, Some See Map for Egypt,”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2011, <https://www.nytimes.com/2011/02/06/world/middleeast/06turkey.html>, 2025-11-2.

则”，即在彼此关切的重大问题上采取“礼尚往来”“投桃报李”的互惠模式。然而，2013年5月伊斯坦布尔市盖齐(Gezi)公园爆发反对埃尔多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土耳其军警随即镇压，此举立刻招致西方国家对土耳其人权和国内政治的新一轮攻击。土耳其入欧的所有进程被冻结，与西方关系也陷入低谷。2016年末遂军事政变发生后，土耳其率先向美欧盟友通报其国内政治动荡的原因在于“葛兰运动”的渗透和颠覆，并希望引渡葛兰，却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消极回应。相比于土耳其对西方国家中东战略的积极配合，西方国家对土耳其国内政治动荡的消极表态反映出西方国家并未将土耳其视为其真正盟友。土耳其对美欧的“礼尚”并未换来西方世界对土耳其的“往来”。2021年10月23日，埃尔多安突然宣布将美法等10个西方国家驻土耳其大使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掀起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之间新一轮外交风波。

至此，土耳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逐渐疏离，关系的亲密度逐渐下降，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混合性关系退化为工具性关系，形成了“锱铢必较”的对等模式。这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土耳其以中东难民过境为要挟，强制换取欧盟的经济援助；其二，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土耳其以库尔德问题的彻底解决和解除对土出口武器装备限制为要挟，阻止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其三，随着欧洲国家对土耳其加入欧盟谈判态度的改变，正发党政府并不是真正想让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国，而是利用加入欧盟的政治改革，巩固保守派政治势力在土耳其国家政治结构中的权力。<sup>①</sup>

在处理中东、高加索、黑海地区事务中，土耳其与俄罗斯之间实现了由工具性关系到混合性关系的进化。土俄两国因历史宿怨与现实矛盾而始终处于亲密度较低的状态。历史上，土俄之间曾爆发13次大规模战争，造就了双方对彼此的不信任感<sup>②</sup>，土俄两国始终处于“陌生人社会”的状态下。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相互需要是土俄两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相互接近的主要原因。<sup>③</sup>因此，基于“公平法则”的等价利益交换构成了土俄关系互动的主线。中东变局后，土耳其与西方在库尔德问题、难民问题上的矛盾不断加大，土美、土欧关系面临严重危机。这一时期，俄罗斯加大对中东地区的战略投入，并希望通过

<sup>①</sup> Lucie Tungul, “Can ‘the Other’ Become ‘Us’? European Identity and Turkey,”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No.2, January 2013, p. 21.

<sup>②</sup> Fatma Ash Kelkitli, *Turkish-Russian Relation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in Eur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p. 77-85.

<sup>③</sup> Mitat Çelikpala, “Viewing Present as History: The State and Future of Turkey-Russia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July 2019, 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Foreign Policy Studies, p. 27.

拉拢土耳其抗衡美西方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压力。以俄罗斯为主导的阿斯塔纳进程的出现,标志着土俄两国在中东地区事务上出现合作态势,土俄两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利益交换。一方面,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支持的库尔德武装给土耳其国家安全造成巨大压力,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转而谋求俄罗斯的支持;<sup>①</sup>另一方面,俄罗斯始终认为,只要能够抗衡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压力,叙利亚、库尔德等地区问题都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甚至是妥协。<sup>②</sup>因此,在俄罗斯的默许下,土耳其在土叙边境接连开展越界军事行动,在土叙边境设立“安全区”;作为交换,2017年9月土耳其不顾北约国家反对,与俄罗斯签署S-400导弹防御系统的购买合同。

以中东地区的安全合作为契机,俄罗斯与土耳其的关系信任逐渐增强,在其他区域和经济、安全等议题的合作日渐紧密。在高加索地区,土俄两国共同促成纳卡地区冲突的停火与谈判;在乌克兰问题上,土耳其不愿跟随西方制裁俄罗斯,俄罗斯则支持土耳其作为调解人协调黑海航道安全及粮食外运;<sup>③</sup>在国际能源合作领域,土耳其不顾西方制裁,加快承接俄罗斯天然气转运产能,俄罗斯则支持土耳其的“区域能源中心”建设及阿库尤核电站项目。<sup>④</sup>在此期间,土俄关系虽然出现俄罗斯大使遇刺、土耳其批评俄罗斯克里米亚鞑靼人政策等外交摩擦,但并未因此影响土俄合作的进行。面对2024年12月叙利亚国内局势巨变,土耳其外长费丹(Hakan Fidan)甚至坦言土耳其成功说服了俄罗斯不要进行军事干预。<sup>⑤</sup>在不断的关系互动中,土俄两国合作日趋紧密,出现了由工具性关系向混合性关系进化的趋势。

**3. 帝国圈层：“帝国遗产”与土耳其外交。“帝国不仅存在于过去,也属于今天。我们需要检视的是帝国遗留的政治形态与影响。”<sup>⑥</sup>作为奥斯曼帝国衣钵的继承者,土耳其的现实政治无疑与奥斯曼帝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埃**

<sup>①</sup> İnan Rüma and Mitat Çelikpala, “Russian and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ctivism in the Syrian Theater,” *Uluslararası İlliskiler*, Vol.16, No.62, 2019, p.84.

<sup>②</sup> Mitat Çelikpala, “Viewing Present as History: The State and Future of Turkey-Russia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and Security*, April 2019, 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Foreign Policy Studies, p.20.

<sup>③</sup> Emre Ersen, “Evaluating the Fighter Jet Crisis in Turkish-Russian Relations,” *Insight Turkey*, Vol.19, No.4, 2017, p.86.

<sup>④</sup> Volkan S. Ediger and Duygu Durmaz, “Energy in Turkey and Russia’s Roller-Coaster Relationship,” *Insight Turkey*, Vol.19, No.1, 2017, p.151.

<sup>⑤</sup> “Turkey Convinced Iran and Russia to Abandon Assad, Foreign Minister Says,” <https://www.middleeasteye.net/live-blog/live-blog-update/turkey-convinced-iran-and-russia-abandon-assad-foreign-minister-says>, 2025-11-2.

<sup>⑥</sup> [美]克里尚·库马尔:《千年帝国史》,第19页。

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保守派政治精英试图将奥斯曼帝国的“共同历史”应用到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地区和中东地区,目的是“在国际舞台上打造一个与土耳其真正国际地位相称的‘新土耳其’”。<sup>①</sup>

在“新土耳其”的战略构想下,土耳其在国内出台一系列政策、在国际上持续强化与前奥斯曼帝国领域范围内国家和地区的外交联系。在国内,正发党政府不断淡化国父凯末尔的纪念活动,代之以纪念“征服君士坦丁堡”和纪念先知穆罕默德降生的政治活动。<sup>②</sup>时任总理埃尔多安在官方演讲和日常语言中也精心挑选奥斯曼土耳其语中的象征性词汇,试图在民众心中唤起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荣光”;2010年以来,以奥斯曼帝国历史元素为象征符号的文化元素愈发在土耳其社会风尚中占据主流。例如,在土耳其餐馆中出现奥斯曼元素的菜单、伊斯坦布尔等主要城市中修建宏伟的圆顶尖塔建筑、举办奥斯曼土耳其语培训课程。<sup>③</sup>

自2023年中东变局后,土耳其领导人频繁出访中东、高加索及巴尔干地区国家,在外交活动中有意强化土耳其与相关国家基于奥斯曼帝国历史的联系。2017年12月,苏丹将位于红海沿岸的一处岛屿租借给土耳其,因岛上有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迹,埃尔多安在演讲时宣称:“(土耳其人将)恢复它,并使其配得上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荣耀。”<sup>④</sup>正发党执政至今,土耳其将奥斯曼帝国历史作为一种工具,通过政治象征的方式来扩大国际影响力。在正发党的塑造下,土耳其外交出现了较为显著的转变:其一,强调奥斯曼帝国是“文明的摇篮”,土耳其作为帝国的继承人,既是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所有者,同时也是遗产的守护者与传播者;其二,对原奥斯曼帝国领域内的国家加大外交投入,通过广泛的文化合作强调共同历史的相似性;其三,利用“土耳其合作与协调局”(Turkish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Agency, TIKA),加强对非洲之角、巴尔干地区和高加索地区国家的经济援助,试图在地区层面重现以土耳其为中心的“帝国历史辉煌”。<sup>⑤</sup>

① Aurel Lazăr, “Weakening Transatlantic Links? Re-assessing Turkey-NATO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L'Europe Unie*, No.17, 2021, p. 75.

② Umut Uzer, “Conservative Narrative: Contemporary Neo-Ottomanist Approaches in Turkish Politics,” p. 287.

③ Hakan Ovunc Ongur, “Identifying Ottomanisms: The Discursive Evolution of Ottoman Pasts in the Turkish Present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51, No.3, 2015, pp. 426-427.

④ Asya Akca, “Neo-Ottomanism-Turkey's Foreign Policy Approach to Africa,” [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190409\\_NewPerspectives\\_Akca.pdf](https://csis-website-prod.s3.amazonaws.com/s3fs-public/190409_NewPerspectives_Akca.pdf), 2025-11-2.

⑤ Pınar Aykaç, “Multiple Neo-Ottomanis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urkey's (Trans)national Heritage: TIKA and a Dialectic between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cy,” *Turkish Studies*, Vol.23, No.3, 2022, pp. 359-373.

相比于浓厚的奥斯曼帝国传统，西方化和“欧洲化”只不过是土耳其内政外交中的“冰山一角”。理解土耳其外交的精要不在于看它是否真正融入了西方，而是看它如何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遗产、文化传统转化为当下的外交工具。埃尔多安执政以来，土耳其充分认识到自身所具备的多元化历史遗产和文化传统，并将之转化为在外交中关系判断、关系选择与关系经营的标准和“资本”。以圈层外交视角观之，土耳其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外交嬗变只是在不同关系圈层中进行差异化关系运作的表现，体现了土耳其在不同关系圈层内的行为模式。不过，中东、黑海、高加索这三个地区属于土耳其圈层外交的复合地带，极易出现对关系性质的误判。例如，高加索和中东同处亲缘、地缘和历史三大关系复合地带，土耳其对也门胡塞武装、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等的支持极易引发与美国及其盟友的地缘政治博弈；同样，土耳其与阿塞拜疆之间“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绑定关系也加剧了高加索地区亚阿双方力量对比的失衡，可能恶化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双边协作关系。因此，土耳其在圈层复合地带仍将面临重大外交考验。

## 结语

在关系理论视野下，国家始终处于关系世界中，一段或多段关系的性质决定国家的政策行为。国家在关系世界中会对其所处的关系环境进行关系判断和关系选择，依据亲缘（民族宗教、意识形态等的相似性）、地缘（地理毗邻和国家实力）和历史三个标准形成特定的关系圈层。关系圈层在构型上主要有三重特征：其一，关系圈层都是以特定国家行为体为中心的，依据关系的远近亲疏予以划分；其二，关系圈在横向层面体现了国家所处关系环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纵向层面则体现了国家在不同关系圈层内具有不同的等级地位；其三，关系圈层彼此复合、内嵌，统一于国家行为体的关系实践中。

在不同的关系圈层内，国家行为体也将遵循不同的行为逻辑。在由亲缘因素形成的关系圈层中，情感性关系占据主导，国家行为体在身份上彼此认同，类似于人际关系中的“亲情社会”；在该圈层中，行为体奉行“需求原则”，即对各方通常采取一种不求回报的互助模式，几乎不进行“成本—收益”的衡量，而是突出一种情感上的“共同体”意识。在由地缘和历史因素形成的关系圈层中，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并存，需要依据具体的关系情境予以区分。在混合性关系主导的关系圈层中，国家之间类似于人际关系中的“熟人社会”，有发

展友好关系的愿望，并依据“人情法则”行事，即在不同地区或国际问题上相互支持，理解对方的政策底线和原则立场，以“礼尚往来”“投桃报李”的政策逻辑加强国家间的利益交换和关系平衡。在工具性关系为主导的关系圈层中，国家之间处于“陌生人社会”的状态中，国家之间关系信任程度低，对彼此心存戒备，只能进行等价的利益交换，不愿为发展情感上的友好关系而承受损失，故国家行为体主要奉行“公平原则”。

在关系世界中，情感性关系相对稳定，国家之间的亲缘联系一旦确立，其行为模式不容易改变；而混合性关系和工具性关系则可能发生相互转化。国家间关系可以因为关系信任的丧失而由混合性关系退化为工具性关系，也可以因为关系互动的增加而由工具性关系进化为混合性关系。主导关系类型的改变将导致国家行为体在关系圈层内部的行为模式发生相应改变。由此可见，在关系理论视角下，国家之间关系的好坏不取决于实力对比或观念因素的先定分配，而是在于国家之间能否实现有效的关系运作，能否依据相应的“关系法则”行事。

本文以土耳其外交研究中的迷思为问题意识、以秦亚青教授构建的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和曾向红教授提出的焦点—场域法为本体论方法论工具，提出了圈层外交分析框架，并尝试借助土耳其案例明确：外交政策分析应跳出西方理性主义理论范式的窠臼，找回关系和情境。这是为呼应“中国和土耳其互为方法”“超越既定‘北方’理论范式”的一次尝试。<sup>①</sup>不过，圈层外交分析仍具有一定限度。首先，本文仅以土耳其为案例，在圈层外交分析法的普遍性适用问题上还存在不足；其次，关系的扩展具有因文化而异的不确定性，土耳其是伊斯兰国家的典型代表，在伊斯兰国际体系中，国际关系实际上是由同心圆结构所组成的部落政治，与关系圈类似也具有亲疏远近特征。<sup>②</sup>由此一些问题值得重视，中华文化提炼出的关系圈与伊斯兰文化所提炼出的同心圆结构有何区别？来源于伊斯兰文化的经验对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有何启发？关系圈层中地位等级的差异如何造就国家行为模式的不同，关系圈层中的三种主导关系类型之中的进化与退化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皆有待进一步探究。

---

<sup>①</sup> 参见昝涛：《区域国别研究需要认识论的非殖民化：以土耳其研究为例》，在第四届“奥斯曼—土耳其历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全球史视野下的奥斯曼—土耳其）开幕式上的演讲，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四会议室，2025年10月17日。

<sup>②</sup> 孙德刚：《伊斯兰国际关系理论：概念阐释与逻辑起点》，《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23年第1辑，第383页。